

“理论”之后的新型写作及其汉语因缘

刘 阳

内容提要 国际前沿上多种修补“理论”的方案，未及根除“理论”的盲点，即尽管致力于拆解自明性，自身却仍不得不依托于语言而也始终内含深层结构，使所说同样成为某种假象而待拆解，动摇了该方案得以成立的基础。“理论”之后，很自然地便需要在自控性祛魅的同时主动显示受控的一面，发展出积极兼容二者的临界写作；它来自符号打破二元对立深层结构、置回区分关系网络后的复杂重组及其文学实质，话题写作、事件写作、转义写作与喻说写作富于学理序列地展开为其具体方式。它们与我国诗性传统在是否自觉针对形而上学这点上呈现区别，在创造话语效果方面则具有联系：二者基于扬弃的融合，不失为“后理论时代”增进民族文化自信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 “理论”之后；祛魅悖论；自控—受控；新型写作；汉语因缘

在晚近西方研究中每每以大写字母起首的“理论”（Theory），指20世纪后半期以来被福柯等一批哲学家的哲学影响催生并持续至今的批评理论。如乔纳森·卡勒所总结，“理论”兴起的初衷是批判常识性观点或者说自明性。自明性相信存在着被语言所描述的对物，基于语言论学理的“理论”证明这种信念是形而上学。因为语言作为不与事物存在符合关系的符号系统，始终重新说出而非传达着事物，而去替代事物即在符号区分中创造意义；符号的区分作为语言的具体使用——话语，带出位置的差别而说出现实中的等级，使作为深层结构的话语权力不知不觉地实现为自明表象。半个多世纪以来，“理论”由此致力于各种祛魅。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后，其客观上不断重复着的操作惯性，也逐渐引发各种不满，而渐渐走向了衰落。

一 修补母体：“理论”之后的主流现状

美国学者纳普与迈克尔斯合撰于1982年的《反“理论”》一文较早指出，“理论”的问题在于“总在事实上不存在差别的地方制造差别”，并“想象出一种没有意图参与的语言模式”来奇怪地服务于自己的认识论目标，仅仅成了“逃避实践的企图”^[1]。达芙妮·帕太与威尔·卡洛提出了解除文学研究中“理

论”正行使的“文本骚扰”，重返宽广多样的人类经验的记忆表达及其快感的思路，并犀利断言“具有独立思考头脑的学生都会感到文学作品中‘理论’的偏移性应用犯了病，他们能洞察到被选出的诗歌对‘理论’决定作用的超越”^[2]。尽管这种整体上以破代立的反应在西方处于支流，但基于正在加速的现代性诉求，晚近我国学界不仅同样很自然地出现了接受“后理论”话语的热情，积极译介与追踪研究相关前沿动态^[3]，而且也每每立足于诗性文化传统而呼吁重返审美经验、文学文本与生活世界，应该说其中的一些观点客观上是较为接近上述思路的。

与之相比，由于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诗性传统，“理论”之后的西方主流是推进与细化“理论”。据王宁的考察，1996年7月举行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最先提出了“后理论”概念，马丁·麦奎兰等四位学者在题为《“理论”的愉悦》的会议文集导言中，声称“后理论”是一种“还在到来中”的“理论”^[4]，从标题到论述都体现出对于“理论”的某种眷顾。2000年朱迪斯·巴特勒等三位美国学者合编的《“理论”剩下了什么》一书，以该书名表达出既不反“理论”也不固守于“理论”、而“重新安排”“理论”与其剩余之物以及文学的关系的折中态度^[5]。2003年，伊格尔顿也出于重建

政治批评的一贯立场，在《“理论”之后》一书开篇强调“理论”作为“指导性的假设”，“仍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6]。本着类似的立场，拉曼·塞尔登等三位英国学者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虽推出“后理论”概念，却感叹“对最近的过去的弃绝是令人惊讶的”^[7]，其试图接着“理论”讲的用心是可辨的。这些信念都启动了修补“理论”的新途。

在这条新途上，2010年尼古拉斯·伯恩编辑的《“理论”之后的理论》一书，以及2011年简·艾略特与德里克·阿特里奇合编的文集《“理论”之后的理论》，集中描画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修补动向。尤其是后者，大体汇集了新世纪前十年国际学界关于“理论”之后的代表性思考。两位编者在该书导言中提请遏制“文化理论对神谕式人物们的作品的迷恋倾向”^[8]，倡导一种开放而无终点的非静态经典化视野，主张在其中让理论研究不再狭隘地围着某个理论家转。尽管他们以较大篇幅历数了“理论”行进至今暴露出的那种纵容智力入侵的野心，却不打算从根子上动摇“理论”的大写性，以至于在提出消解“理论”神谕的主张之际，并未形成走出神谕化思路本身的明确诉求。这方面更为典型的例子，来自2004年美国学者米切尔。2003年在为著名的《批评探索》杂志举行的专题研讨会撰写的引言中，他颇具倾向性地将流行至今的“理论”描述为具有“普遍掌控欲、一致性与解释性力量”的“高级理论”（High Theory），指出对它的反抗需要建立起既承认“理论”危机、又不纠缠于对其是生还是死的判断（这让人感到了回护的意味）的“中等理论”（Medium Theory），后者“不再激进”^[9]。与这种看法相近，迈克尔·哈特也指出，“理论”正陷理论家于一种“连续性忧郁”中，消除此种忧郁，得削弱“理论”的统治，以“限制我们被统治的程度与方式”^[10]。那么如何从高处降低“理论”呢？

从集中刊于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南大西洋季刊》2011年冬季号上的一组学术论文，以及上述艾略特与阿特里奇合编的文集中，可观察到由此形成的两条具体思路。一条是以新换旧，以新“理论”更替旧“理论”。肯尼斯·苏林呼吁生产出作为“绝对必然性”的理论来替换当下已耗尽元气的理论神谕^[11]。克拉里·克尔布鲁克在检审奈格里与哈特

的立场后认定，“理论”之后的理论只能是人类之后的理论，因为“理论有可能是从疏离与距离化开始的，它将考虑一个不再是我们的世界”^[12]，以后人类为主题词的后人文主义便对此作出初步的尝试。这样，“理论”的形式框架不变，不过往里填充新的内容。另一条是以新联旧，在保持“理论”形式不变的前提下，顾及新旧内容的联系。彼得·奥斯本不赞成以简单超越现状的方式来变革“理论”，相信“哲学传统是所涉文本、原则与程序皆构成了自觉回溯结构的、由权威代际传承下来的知识连续性”^[13]，建议在改进“理论”时，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其与黑格尔、尼采等理论传统的潜在密切关系。卡里·沃尔夫觉得，“理论”不应丢弃对德里达所谓“无条件的自由”的忠诚^[14]；在此语境下，对其施加“解毒剂”或者说修补才有意义。杰森·波茨与丹尼尔·斯托特则认为，当前需关心“理论自身留下的反思形式”，以及“那儿可能已经有了什么”^[15]，即在同时包括形式与内容的“理论”母体上进行修补。

二 难以根除的盲点：祛魅悖论及符号学推演

从根子上看，“理论”对自明性的拆解，源自对深层结构及其话语权力实质的发现与还原。但话语权力是语言自带的权力，只要语言进入具体被使用状态而成为话语，由符号区分而生的权力因素就避无可避。始终以语言揭示着种种自明现象深处话语权力的“理论”，自身有没有暗藏深层结构？假如有，那它就在语言中揭露语言而形成了一个怪圈，即以自明性拆解着另一种自明性。阿特里奇等人之所以未走出“理论”神谕化的老路，根子或许即在于此。故福柯一方面在其疯癫史考古的最后批判以精神分析学为代表的“理论”的理性压抑机制，一方面又被公认为“理论”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当学者们生动地对“理论”试图废除君主、却依旧蹈袭着君主演替模式的特征进行评论时^[16]，其潜台词也可以从此端观察。这形成一个悖论：如果相信一种“理论”所揭示的内容（某种具体的自明现象暗藏深层结构，而需要被祛除假象），便不能接受这种“理论”（它自己因离不开语言而也暗藏深层

结构,使上述具体所说也成了某种不可信、并待祛魅的表象或假象)。依赖于语言这个毋庸置疑的前提,“理论”单靠自己无力根除所陷入其中的这一困局,试图进行自我修补的诸般思路因而难以治本。

可从符号学角度深入推演这一点。“理论”,例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族裔理论,热衷于拆解对象中的“西方—中国”“男性—女性”“自我—他者”等二元深层结构,但在如此拆解时,这些“理论”作为必须确保自身成立的祛魅者,也同时进入了“祛(理论主体)—魅(理论对象)”的言语链,进入了同样的符号二元关系(结构)并随机占据了“祛”这个符号位置。之所以随机,是因为这个符号位置仅仅由于与别的符号相区分、被后者区分出来而存在,至于怎么区分、往哪个方向区分,都没有必然的道理可讲。而由于随机,也就不是不可位移的,“祛”这个位置就同样并非自明而是特殊的,在此情况下试图将它必然化与固定化,就出现了深层结构:变区分为对立。这一结构与它试图拆解的上述结构,在符号区分上一致:都是符号的二元对立。这一来,拆解对象的权力等级,包藏着同时拆解自身以至于失据的悖论性危险,在理论效能上仿佛始终退不到底线(因为一退至底线便取消了自我)而无限地被推迟着,授人以柄便不足为怪了。例如面对国民性问题,后殖民理论娴熟地拆解西—中二元符号对立话语结构中那个被西方人想象出并塑造成的中国形象。诚然产生出一些新颖的结论,像看到阿Q身穿“洋布的白背心”便敏感地追问“中国国民性的理论是否也如白背心一样,是洋布编织出来的”^[17],却始终无法打消人们在耳目为之一新后仍半信半疑的反应:那么国民性究竟有没有呢?曾遭鲁迅针砭的那些痼疾,果真不存在于现实中而只是被语言蓄意编织出来的一套神话吗?之所以容易令人滋生出这种不彻底感,是因为当后殖民理论精心去揭穿包裹于国民性话语中的深层结构时,它同时用语言做着这件事,语言使它这么做而不那么做的理由,是在符号之间随机地区分出“祛”与“魅”的相同二元结构,于是当撬动所述层面的二元结构,便同时也松动了所行层面的二元结构。

“理论”之后,如何避免这种悖论呢?原则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仍保持所行层面上的“理论”

的牢固祛魅姿态,而让所述层面上的深层结构不再二分化。这难以在现实中兑现。因为深层结构基于符号的区分而至少包含两个位置,要求自明性的深层结构不再二分化,岂非等于否认了深层结构与语言中话语权力的存在?那便走上了形而上学老路。因此,只能相反作另一种选择:不取消对自明性的话语权力实质的承认,同时不遮掩这种承认行为的来源,而从正面交代它同样处于话语权力支配中这个事实,显示出(即看清)“祛—魅”这一二元对立结构是如何在符号关系中被特殊区分成的,即显示出导致了这二元对立项(A与B)的第三项(C)及其与前两项结合项(AB)的进一步区分关系(ABC)。如此,“显示出”就意味着保持住无穷的进一步区分关系,而不在某项上固定与停止。这个过程便将区分关系置入了更大的网络中——在区分中继续区分与不断区分,由此实现符号的无限重组。诚然,每一次重组会形成新的深层结构,但始终保持重组的复杂程度,令符号的一对对不同区分关系在关系网中并存,形成话语权力上的相互制衡,客观上才保证了对自明性的拆解不重蹈“祛—魅”的二元深层结构窠臼。而符号的无限复杂重组,意味着充分敞开符号间高度灵活自由、始终处于活跃动态而不固定的区分潜能,那不正是语言对意义的陌生化创造吗?所以,在祛魅中同时展示出支配祛魅行为的话语权力,实即是使话语权力积极生成陌生的、避免了熟悉(惯性)化的意义。

这与“理论”划开了界限。问题在于,当它始终不断重复对符号作这种二元区分时,祛魅的惯性逐渐使之凝固为操演的模式。按德里达的观点,可重复的是不可经验的,超验而无限重复为同一理想对象,必然包含在场的盲点,成为历史上各种形而上学的隐秘而值得被解构^[18],其重复性的操演模式,所操演的是罗曼·雅各布逊话语六要素中的发信人—收信人模式,具备动机与目的而指向外部自明对象,对“理论”而言,这外部对象即在重复操作积累中形成的主体意识。而将“理论”的拆解过程更替为无限灵活复杂、因而陌生化的符号区分与重组时,“理论”凸显自身的语言构造,不再指向外部那个并不自明存在的对象,因符号重组的无限可能性及其朝向未来的时间性筹划,而在对意义世界的话语

建构中化原先拆解姿态的手法性熟练与程式性反复为有所不知的陌生。“理论”正是沿循这一学理逻辑，而自然地调整出新方向的。

三 方向与思维自然调整： 自控—受控、临界写作与文学实质

发信与收信的模式化二元结构及其主体意识积累，令“理论”的祛魅无形中成了纯粹自主控制的。打破这一模式所实现的符号复杂重组，因未知性空白而感到陌生，遂使主体意识受限与受控。这一变化的关键——符号的无限复杂重组，即突出话语材料本身的构造以深化符号与对象的对立，属于雅各布逊话语六要素中的文学性。自控与受控的这种临界状态从而就是文学。不再纯粹地自控，即走出可重复而不可经验、无限反复并形成同一理想对象的主体意识。这是由于意识发出的自控指向围绕以为自己在场的自恋结构（德里达语）而展开，在缺乏语言自觉介入的情况下是形而上学的寄居地。笔下的情节与人物命运挣脱作家主体意识控制而往前走，这一自控与受控的临界状态不发生于意识的切换性操控，也不在普遍意义上来自偶然的无意识（灵感），而来自语言符号被主体意识发动起来后逐渐复杂区分、重组而获致的运作与显现能力。“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方为夫”这样一种新奇的说话，不来自主体意识的事先规划，而是由于“丈夫”这个词被符号的连接意义上拆分为两个单音节字，进而以自身内在规则完成了一次意义的建构。当然，它也成为了一个文学的句子。诸如此类的情形，得深入联系语言的运作与显现能力（从主体这边看即一种受控力），即联系主体意识因受控于语言创造而与之微妙构成的张力，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由此开始调动“理论”潜质的，就是这股文学特有的张力。受控而感到陌生，是因为有未知的东西尚未被看清，这就展开了一个把“理论”吸摄于其中的更大背景。在此背景中，走向文学的“理论”在祛魅的同时，主动呈现出自己同样是被塑造与建构的，如此，“祛一魅”二元符号结构在这种显示中被打破，祛魅遂不再为自我悖论所困。“理论”之后，从而引出了文学所可能扮演的有趣角色。

角色的这种转换，在操作层面上自然伴随着思维方式的相应调整。当“理论”始终只能立足于语言来揭露话语权力时，这种揭露以一种即时生成着的自明性去拆解另一种作为目标的自明性，仍奇特地保留下主客二分的思维掩体，这一掩体便来自理性的狭义操作形态——合理性。前述种种质疑的声音，都与此有关。当逐渐走向文学后，“理论”对超出自控能力的陌生世界的筹划，是出于对可能性的需要，需要的产生意味着情感的产生，而情感则是感性所引发的。感性、情感与上述狭义化了的合理性相斥。纵然如此，被“理论”普遍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感性、情感还有与理性相容的一面，此时理性则从狭义中释放、上升而恢复为完整的。感性、情感与直观这几种不是理性也不反理性的心意能力，顺应语言符号的创造性重组活动（情感→需要→想象→替代→建构→符号系统；按胡塞尔，本质直观=个体直观+自由想象，因而涉及语言），正是文学的思想方法。对它们的汲取，使“理论”有可能更好地来实现语言论学理的自由效应。

这种效应的重要内容，或许是引导“理论”不再执守于大写的惯性，而积极回归理论一词的希腊、拉丁文化内涵：观察与沉思。后者与上述思想方法一致，实为文学的优势。如威廉·拉什推出了让“理论”转型为小规模观察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沉思”的主张^[19]，莱·特拉达表述了并无本体论以及“左本体论”这种整体性的东西^[20]、亟需持存“理论”的经验复杂性的看法。这都从不同角度显示出对“理论”受控的一面的向往。在此视野中，一些学者勾勒出了“理论”之后走向文学的迹象。大卫·辛普森的《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的统治》（1995）与乔纳森·卡勒的《理论中的文学性》（2007）是较为明显的尝试。晚近方兴未艾的新审美主义，则可视为卡勒在2012年所瞻望的“理论”发展六动向的证明^[21]。雅克·朗西埃饶具深意地指出：“20世纪的批评家以社会学或机构与观念史的名义，自以为揭露了文学的天真，……然而他们所使用的用以讲述文学文本真相的解释模式，却是文学本身所铸造的模式。”^[22]国际叙述研究学会前会长多萝西·霍尔也认为：“揭露的兴奋——指出在审美的掩盖下进行的政治运作的兴奋——已让位于这样的愿望：对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社会价

值,以及文学批评家的作用做出积极的描述。”^[23]他们在如何具体实现“理论”与文学的互融这点上止步,尚未及详究“理论”之后究竟存在着哪些新的写作可能,而使接下来对此的正面探索充满挑战。

四 四种新型写作及内在学理关系： 与“理论”对比

如果“理论”之后的突破口与推进点是对自控兼容受控的发现与承认,那么,在自控与受控的临界状态,视点发出的观看始终是正被理解着的世界的一部分,观看方式从而是所观看之事获得的一个具体观察框架,一种如海德格尔所说使人融于世界的因缘整体性,看到的则是流变中的相态。而由于视点的观看在动因上是听任的(即必然带有先见的)、不具反思性的,否则反思(看清)到自身后的视点便已离开原先观看位置而不复为自身了,它便与某种意欲有关,从意欲出发捕捉话题,随缘地进入话题以展开不重复的因缘情境,形成“理论”之后的第一种新型写作:话题写作。

走向文学的“理论”在顺应视点因缘的情况下,直接独立出话题并展开写作,可发掘其超越“理论”的思想可能。如对“时间”这个现实话题产生兴味而展开因缘写作,便可给予沉湎娱乐的不自觉者以时间的警告,但无视他人奋斗目标而一味苛求其惜时如金,却更近乎残酷。这一话题写作道出了福柯所洞察到的相同情状:权力对个体的无形渗透,正是借助于“便于使用和控制的方式来积聚时间”的特殊话语方式来实现的^[24]。假借一种堂皇的惜时观念规训莘莘学子,使之违背自身兴趣意愿而南辕北辙,则导致其越貌若惜时,越深陷权力的牢笼而不自知。福柯由此深刻拈出的非理性真谛,于此得到神会默契。这证实了话题写作克服“理论”那个祛魅悖论的潜能:不抽空主体自身所处的具体情境,从而给出了自己。

既然受控状态意味着世界是超出视点观看范围的生长性存在,自由的观看,便需要将齐泽克所谓超出了原因的结果也积极地保持于视野,发动世界超出于视点的未知部分,这部分内容居于临界,视点在那儿说不可说而引导新的例外状态,便激发出

不同于常规而独特的事件,形成“理论”之后的第二种新型写作:事件写作。“理论”的操作性色彩,淡化了库恩与波普尔所说的“反常和危机”^[25],后两者挑明的科学研究中以例外状态为解谜动力的范式革命,进而被晚近事件性思想自觉地与语言联系起来思考,走向文学后的“理论”遂有潜力从正面聚焦事件及其例外性。如对一些习焉不察的流行说法展开事件写作,可能发现其中不为程式化视点所见的例外状态:“严格规范××行为”,既曰规范就谈不上严格与否的程度把握问题,因为法律条文规定增之一分与减之一分都会导致谬误,而缩小了规范的内涵与意义。对这些例外状态的独特发现与精心写作,受惠于话语推敲的文学思想方法,以承认“理论”的祛魅对象同样包括自身有限性为前提。

反过来看,既然受控状态意味着世界是超出视点观看范围的生长性存在,自由的观看便在已有视点位置之外进一步转变观看策略,对理论目标的现成对象性实施转义,以努力穷尽观看的成效。这不唯是对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本性的顺应,而且沿此集中了符号重组的智慧,形成“理论”之后的第三种新型写作:转义写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因操作性因素的积累而在转义创新方面呈现相对的疲惫与颓势,走向文学的“理论”却在灵活操作符号并使之焕发陌生化效果这点上有了新优势。如对《西游记》展开转义写作,便可能发现,天遥地远十四年,取经四众却没有年龄上的变化而是静止的,从头至尾的形象脾性也是一贯的,其神性状态与取经所象征的启蒙精神颇相违背,以至于当事人会多次上同样的当,启蒙在他们心性上仿佛没留下一点痕迹,一切都先验地决定好了。循此不是可以来深入开掘诸如启蒙的优越性、精英话语的自反性以及现代性体验的复杂性等思想史议题吗?这种转义写作克制了“理论”的操作惯性,而将其自我反思也同时端了出来。

在自控中创造性地敞开受控状态时,视点与世界的非符合关系,决定了前者最大限度地创造出后者真实性或曰场面质感这一本体任务,这取决于文学的自由创造。语言的符号系统性质决定了视点对现场的斥力。自由的观看则又源自于现场对视点的吸力,身临其境而不隔,才是观看的真实性所系。

包括“理论”在内的任何语言活动，都存在着协调这对斥力与吸力的关系的问题，可“理论”的祛魅惯性及其未能跳出的合理性窠臼，使它并不在意自觉处理上述关系，而仍以斥力（抽象思辨）为取径，这确实是它晦涩而惹人诟病的原因。走向文学后的“理论”对这个局限的克服，是统一斥性的叙与吸性的事，而这正是文学的主题与难题。因为贯通叙与事的桥梁，是叙述时间、视角、人称与声音等涉及“讲”法的叙述要素，以及由它们共同创造的想象性世界，一个用某样还没有的东西去替代（创造）另一样已有的东西，从而顺应语言本性的隐喻世界。这种统一因而体现为一种喻说。

喻说以想象为桥梁统一斥性的叙与吸性的事，想象作为对未知世界的需要，是关于已知世界应如何的评价，这必然在喻说中产生评价。在客体向主体融渗的意义上，它使“理论”从客观对象中选择契合主体意向的部分，不再遮掩“理论”所习惯于遮掩的这一点。反过来，由于“需要”这种情感产生后具有弥散性，在主体向客体融渗的意义上，它又调节着“理论”关于对象的评价，在调节中不断丰富自身选择对象的理由与可能性，对自己关于对象的评价进行评价。评价对象（选择）与评价自我（调节）的这种双重统一，使“理论”克服祛魅悖论及其二元对立的合理性窠臼，形成“理论”之后的第四种新型写作：喻说写作。如面对海德格尔的“人生在世”学说倍感艰涩而难得其解时，祭出柳宗元《小石潭记》写鱼名句“皆若空游无所依”，似乎在喻说中令人领悟到现代存在论的义谛：一个与“是”比照而来的“若”字，在评价意义上道出了空与非空（虚与实）的存在论差异。倘若想进一步廓清这种差异，借助吴非的喻说写作《看和尚晾牛仔服》又如何呢：和尚业余穿牛仔服，虽令人莞尔，却体现无甚可指摘的正常人性（那是回归生活世界的存在状态）；但曾“宣过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腐败者^[26]，却体现反常的人性，两相比照之下，存在状态孕育有人格的人性或者说超越性，不着理论一字而尽得风流。

具体展开上述新型写作时，可以适当吸收20世纪以来涉及“写作”的文论思想，如利奥塔以“误构”为基础的小叙事观（可启示话题写作），布朗肖、

德勒兹与伊莱·罗纳的文学事件观，阿甘本对例外状态的研究（可启示事件写作），罗兰·巴特与德里达的阅读即写作观（可启示转义写作），以及本雅明的讽喻观与保罗·德曼的修辞阅读观（可启示喻说写作）等。创造性地汲取它们富于生命之处并予以积极转化，不啻推陈出新。

这些新型写作均立足于“理论”之后拆解与建构的创造性共存这个基点，客观上呈现为学理严密衔接的序列。话题写作从整体定位上展开自控性拆解与受控性建构在“理论”之后写作形态中的兼容，后三种写作都是在它基础之上的纵深展开。事件写作着眼于视点不动而世界变动的情况，转义写作则关注世界不动而视点变动的情况，属于上述兼容得以具体展开的一体两翼。前三种写作，都是对自控/受控的创造性兼容的自然顺应，最后一种喻说写作则主动创造这种兼容，从更高的层面上将“理论”之后的新型写作推向了前沿。

五 汉语因缘考量：扬弃后的联结如何可能

当在文学走向中错综展开“理论”之后的上述新型写作时，文学的动词性功能也从正面浮现出来，它不再囿于静态的作品狭义，而成为一种有助于“理论”更新自我的思想推动力。比较而言，对文学这种思想功能的体认，在我国比在西方更容易引起共鸣。因为在主客二分思维影响下，随着主体性程度的加深，西方思想传统倾向于将对象理想化，化丑为美。18世纪法国学者阿贝·巴托首倡的“美的艺术”观念，主张艺术模仿美的自然而非一般自然，便赋予文学以理想性，在典型的认识论（区隔）立场上设置了纯文学界限，持续达几个世纪之久。而纯文学观念在我国从王国维（主要指其《文学小言》等著述）等研究者算起，迄今不过一世纪。非对象性思维使古人倾向于开放地允诺杂文学观念，有力证据便是《文心雕龙》论及的众多应用文体因具备文采，而皆被冠名为“文”。鉴于文学观念在汉语传统中获得的这种开放性，文学似乎具备了进入汉语理论表述的潜在可能。

“‘理论’之后”道出了上述新型写作在学理

上与“理论”的联系性渊源：即使反拨它，也得进入它的学理脉络后再有序、合理地出来。而如本文开头所分析，“理论”的兴盛原本也有其学理上的清晰理路可寻，它牢牢建立在言论这一针对形而上学自明性的学理基石之上。“理论”到“理论”之后的学理演进逻辑，因而自然展开于对“超越形而上学”这个具有生长连续性的本根的自觉坚持。有针对性地去超越某对象，意味着与之展开严肃的争论，被上述线索承继与积累下来的品质，从而是理论思维的执著、担当与较真的争论姿态。与之不同，我国当代人文学术比如文论，其实并无在批判意义上回应形而上学稳定传统的迫切动力，而在不争论的超然姿态上具有某种共性。争论可能是为了最终不争论，但那是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与从一开始就不在意或者说缺乏争论热情的情形有别。可以将西方与我国的这种传统差异描述为“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后者总能在妥协中找到不断重新恢复和谐的第三项平衡点，而使尼采发出的“上帝死了”的呼告移至我国后并不令人产生天快要塌了的、抽去了生存根基的危机感。那种有感于西方形而上学步入了死胡同而以我国诗性传统登场为直接出路，试图援中释西的反应，因而恐怕存在着简化不同语境的嫌疑。联结的限度就在这里。

这使我们试图联结诗性传统与“理论”之后的新型写作时，首先获得了扬弃的敏感。在扬弃的基础上，才能辩证地谈论两者相融合的可能，那首先是对话语效果的持久开发热情。《左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曰“辞达而已矣”，都倡导让文辞在精心的琢磨中变得优美而通达意义，话语的创新效果在此关乎国运。《文心雕龙》起首五篇详尽论证了“文”并非雕虫小技，而是根源于天地万物之道，道有文采，人则以有心之物的特殊身份去用心创造精美的语言作品，如书名所示那般精细雕刻龙纹，求得结构组织上的特殊表达效果与意味。王国维提出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指语言并非传达诗人已设定的境界，而是直接点出境界来。凡此种种，皆与文言得天独厚的诗性优势密不可分，其中多有值得“理论”之后积极借鉴的写作智慧。

文言符号系统简洁含蓄的表意弹性，使表面效

果之下的深层结构开放地接受阐释的灵活介入，在表里的灵活渗透中弱化了符号区分的程度及其话语权力后果。白话符号系统在表意上则须追求全面完整，其符号的相互差别相应地呈现出非此不可的特点，区分程度高于文言，话语权力相对显得突出，以至于“当一句白话愈白愈透明时它的被掩盖、被压抑、被遗落的部分也必然愈大。因为当语言太透明时，反表达的作用必然大过表达的作用”^[27]，而使表面效果与深层结构更具距离，自明性更具掩体。由此，“理论”在白话语境中更应探索如何在拆解一种自明性时，摆脱因基于同一套白话系统而难免落入的另一种自明性，从而把拆解自明性的锋芒指向，适度置回到理论话语自身构造的凸显上。依据这一方向，可以视某些至今犹未引起人们珍视的写作实践为初步借镜。像在国内似乎还没有整体为学界所重的思想随笔写作，便有理由积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些写作每每充满大量与现实息息相关的因缘性话题（例如赵健雄的《糊涂人生》《当代流行语》《都有病》《乱话三千》《危言警语》等），用灵活的笔触引发事件的例外性可能与转义的多维思考（例如吴非与何鑫业的一系列随笔），屡屡可见各种喻说实验（例如陆春祥的《41℃胡话》《病了字母》《新子不语》《焰段》等），由此皆有被深入发掘的潜质。如身份上介于作家（诗人）与学者之间的写作人（这一微妙身份启发我们窥察到“理论”之后新型写作者的面相）何鑫业，撰写的《方向》《气质》《结果》《开合》《方圆》《形态》《长度》《颜色》《观点》《区别》《自我》等思想随笔^[28]，以看似轻松拈来实则深蕴学养的笔调，出入于中西文化传统，叙议各种生存境遇透露出的哲学命题，便取得了可示范“理论”之后新型写作、却还未得到充分估计的成就。类似在以往几乎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大量散落的珠玑，值得运用学术思维进行梳理，建构成一项值得为之奉献智慧心力的学术工程。这样一种有别于“理论”表述的写作方式，不唯打开了一扇新门，而且将有机会融入鲜活的中国故事。汉语因缘最终所接的现实地气，应也就是这份“后理论时代”的民族文化自信。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后

理论’的文学走向及其新型写作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17BWY002)的阶段性成果]

[1] Steven Knapp & Walter Benn Michaels, *Against Theory*. Chicago: Critical Inquiry, 4 (1982). p.736、742.

[2] Daphne Patai & Will H. Corral,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

[3] 我国学者王宁、姚文放、徐亮、宋伟、吴子林等皆对此作出了贡献。可参见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徐亮《理论之后与中国诗学的前景》、宋伟《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与吴子林《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等。

[4] Martin McQuillan, Graeme Macdonald, Robin Purves & Stephen Thomson,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p.xxxi.

[5] Judith Butler, John Guillory & Kendall Thomas, *What's Left of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p.xii.

[6]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2.

[7] 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第3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 Jane Elliott & Derek Attridge, *Theory After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3.

[9] W.J.T. Mitchell, *Medium Theory: Preface to the 2003 Critical Inquiry Symposium*. Chicago: Critical Inquiry 30 (2004). p.335.

[10] Michael Hardt, *The Militancy of Theory*. Durha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Winter 2011. p.19、34.

[11] Kenneth Surin, *Introduction: "Theory Now?"* Durha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Winter 2011. p.3.

[12] Claire Colebrook, *Extinct Theory*. Jane Elliott & Derek Attridge, *Theory After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65.

[13] Peter Osborne, *Philosophy after Theory: Transdisciplinarity and the New*. Jane Elliott & Derek Attridge,

Theory After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27.

[14] Cary Wolfe, *Theory as a Research Programme-the Very Idea*. Jane Elliott & Derek Attridge, *Theory After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46.

[15] Jason Potts & Daniel Stout, *Theory Asid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0—13.

[16] Jason Potts and Daniel Stout, *Theory Asid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

[17] 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第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18] 参见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9] William Rasch, *Theory after Critical Theory*. Jane Elliott & Derek Attridge, *Theory After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60.

[20] Rei Terada, *The Frailty of the Ontic*. Durha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Winter 2011. p.37.

[21] 乔纳森·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生安锋译,《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22] 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第3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3] 多萝西·霍尔:《小说·叙述·伦理》,王长才译,《英语研究》2016年第1期。

[24]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17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5]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第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 吴非:《污浊也爱唱纯洁》,第282—283页,黄河出版社1999年版。

[27] 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第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 该系列思想随笔尚未结集出版,它们陆续刊于1997—1999年《杭州日报》副刊。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吴子林